

从本体认知到战略行为偏向*

——制度逻辑理论评述与展望

梁 强 徐二明

(汕头大学商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内容提要:制度逻辑理论回应了组织学者对传统新制度理论的批判,构建了宏观制度环境到微观个体具体实践间的桥梁,是当前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的最新发展方向。作为一个新兴且处于高速发展中的理论,国外学者围绕“制度逻辑”概念获得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与之相比,国内学界的此类研究仍较少。对制度逻辑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核心概念进行梳理,将有利于下一步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中国情境下实证应用的推广。基于此,本文首先在系统性文献检索分析的基础上,对制度逻辑理论的起源、兴起和概念进行辨析;其次,围绕着“主导制度逻辑-多元逻辑”的理论演变脉络,就多元逻辑性质进行讨论;最后,就制度复杂性和组织回应这一核心话题进行阐述,并指出未来研究主要可从逻辑多元性、动态性等多个方向进行探索。

关键词:制度逻辑理论 制度复杂性 主导制度逻辑 竞争逻辑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8)02—0176—16

一、引言

“‘民众统治’‘民族自决’‘爱征服一切’‘市场是有效的’等信念,并不比‘上帝在天上监视着我们所有的人’这种看法更为理性。……如果不能理解基本分析范畴的历史具体性和制度具体性,社会科学家就可能仅仅诠释其所研究之制度的合理性,并因此成为该制度再生产中的一个行动者。这是十分危险的”(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围绕制度逻辑理论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是当前组织和管理领域新制度理论的最新研究动态。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开创性地将“制度逻辑”这一概念引入组织和管理理论分析之中后,经过 20 多年的探索,尤其是在近十年间寻求制度学派内部改进的学者的推动下,制度逻辑理论逐步成型并成为组织研究中的一大热点话题(Gehman 等,2016)^[2]。尽管都是关注文化规制和认知结构对组织行为、结构的影响(Thornton 和 Ocasio,2008)^[3],但与传统的新制度理论(鲍威尔、迪马吉奥,2008)^[4]致力于解释主导制度对组织同质化现象的塑造不同,制度逻辑观将社会视为一种存在潜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认为正是这种组织所处环境中不同制度逻辑间的不兼容、冲突,导致组织的异质性行为表现及其所处制度环境的变迁(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Thornton 和 Ocasio,2008^[3];Thornton 等,2012^[5])。

收稿日期:2017-11-06

*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继任者自主权、能力禀赋与家族企业多元化战略研究”(2016A03031307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企业创业中制度缺失与战略反应的研究”(71372157)。

作者简介:梁强(1981-),男,广东梅州人,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创新创业与家族企业管理,电子邮箱:qliang@stu.edu.cn;徐二明(1949-),男,辽宁抚顺人,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是战略管理与组织理论研究,电子邮箱:emxu@stu.edu.cn。通讯作者:梁强。

毫无疑问,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有着辉煌的历史和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无论一个理论流派曾经或现在有着怎么样的辉煌,若在积累了大量实证研究以后长时期没有新的突破,它就面临着危机和衰落(周雪光,2003)^[6]。制度逻辑理论的出现,不仅回应了诸多组织理论学者关于新制度理论能动性嵌入悖论(Thornton等,2012)^[5]、缺乏微观基础(Gehman等,2016)^[2]等批评,还作为一个“搅局者”突破了原有新制度理论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其研究内容(Greenwood等,2014^[7];Meyer和Hollerer,2014^[8]),激发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学者新一轮热情。尽管当前仍主要处于理论探索和案例研究阶段(Greenwood等,2011)^[9],但学界在制度逻辑理论这一框架下已经就诸如金融部门(Palermo等,2017)^[10]、医疗机构(Bode等,2017)^[11]、家族企业(Zellweger等,2016)^[12]、小额信贷(Cobb等,2016)^[13]、体育组织(Carlsson-Wall等,2016)^[14]、文化制造业(Dalpiaz等,2016)^[15]、公私合营(Bishop和Waring,2016)^[16]、人力资源(Bevort和Poufelt,2015)^[17]、风能领域(York等,2015)^[18]等诸多议题进行探究。关于制度逻辑的讨论始于北美,但同时也吸引了欧洲(Belenzon等,2016)^[19]和国内管理学界部分学者(郑莹等,2015^[20];余菁、王涛,2015^[21])的关注。杜运周、尤树洋(2013)^[22]曾就制度逻辑与制度多元性对组织多元行为影响的理论原理和基本假设展开了系统评述。

然而,认识一个理论在研究领域中所处的位置是正确应用理论的必要前提。尽管作为一个在近十多年间刚刚兴起新兴理论,但制度逻辑理论的研究焦点却几度变迁。对于一个正处于高速发展中的新兴理论流派,缺乏对其基本概念、发展脉络的认识无疑是十分危险的。特别是在当前学界将制度逻辑理论应用于定量分析的研究越来越多的情形下(Zhao和Lounsbury,2016^[23];Belenzon等,2016^[19]),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和理论总结,将有助于理论研究的深化及理论应用的推广。由此出发,本文在系统文献检索的基础上,首先,围绕近十年间的342篇英文文献展开文献计量分析,对制度逻辑理论的兴起、内涵和核心概念进行辨析,获取支撑理论发展的关键文献;其次,借鉴Thornton等(2012)^[5]、Greenwood等(2011)^[9]的相关阐述,将制度逻辑理论的发展视为其研究重点“从主导逻辑到多元逻辑”演变的过程,并就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多元逻辑性质”与“非市场逻辑”进行系统的评述。特别是,关注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回应互动过程这一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寄望于在理清制度逻辑理论发展脉络框架的同时,能进一步推动理论应用的发展并对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有所启示。

二、制度逻辑理论的兴起与概念界定

1. 制度逻辑理论的兴起:文献检索与简单分析

为了对当前理论的发展和應用有较为全面的把握,本文参考涂智苹、宋铁波(2016)^[24]、张秀萍、王振(2017)^[25]所采用的方法,对制度逻辑理论的英文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首先,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即在WOS核心合集中,以“制度逻辑”“竞争逻辑”“制度复杂性”等相关关键词作为主题对近十年来文献进行检索^①,并分别选取研究领域为“Management or Business”、文献类型为“Article”、语言为“English”的文献。最后得到2142篇检索文献。进一步地,由于制度逻辑相关关键词组与诸如市场营销领域中“服务主导逻辑”等概念在检索中极易混淆,课题组又细致查阅每一篇文献的题目、摘要、内容等,从而进行筛选,将与制度逻辑理论无关文献剔除。最终得到2007-2016年间制度逻辑理论文献342篇。结果显示,相关文献大量发表于《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Organization Studies》《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① 在WOS文献数据库中輸入主题词“institutional logic”“institutional logics”“competing logics”“institutional complexity”“institutional pluralism”“institutional multiplicity”“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进行检索。

《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等领域内有引领作用及较大影响力的期刊。图 1 展示了近十年来 WOS 核心合集中制度逻辑理论历年的发文数量,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制度逻辑理论在近十年来吸引的关注稳步上升,尤其是 2012 年以后发展迅猛。图 2 则进一步选取数篇制度逻辑经典文献的历年被引用量进行分析,通过曲线图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经过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叶的探索期之后,制度逻辑理论相关文献的被引用频率在近年呈井喷状的增长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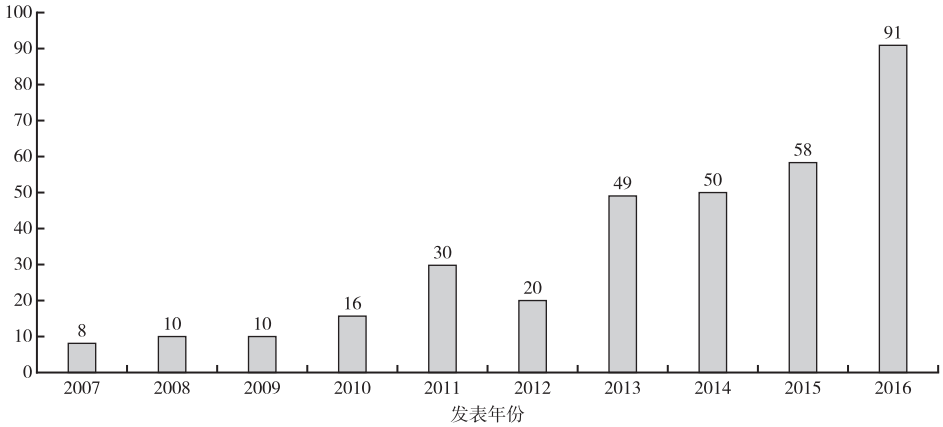


图 1 制度逻辑理论历年文献数量

资料来源:本文根据文献检索结果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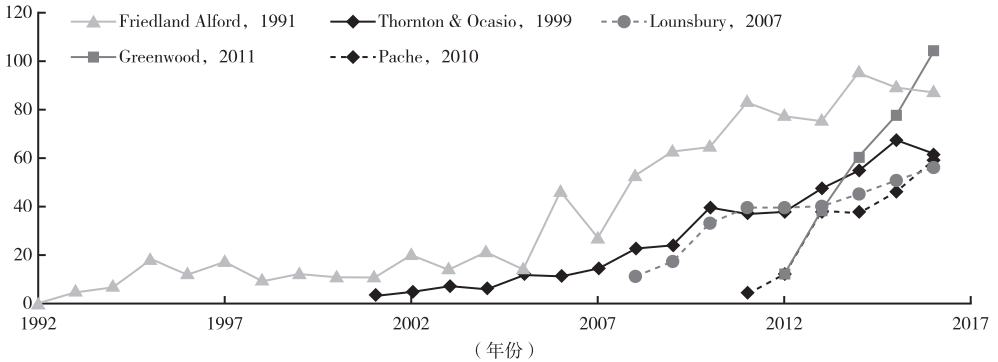


图 2 制度逻辑理论部分主要文献历年被引量

资料来源:根据 WOS 数据库文献被引量整理

2. 制度逻辑理论内涵与概念界定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数篇奠基性论文之后,新制度理论无疑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和管理理论视角(Greenwood 等,2008)^[26]。1991 年,为了进一步界定和厘清新制度主义的独特性分析框架,迪马奇奥和鲍威尔担任主编推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一书。在四篇奠基性论文的基础上,该书不仅邀请了诸如 Scott、Mayer 等制度理论大家,还邀请了 Friedland、Alford 等社会学家的参与。出人意料的是,后两者所著《将社会因素重新纳入研究之中》一文,反而成为该书后来被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鲍威尔、迪马吉奥,2008)^[4],并在后来学者推动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Thornton 等,2012^[5];Friedland,2012^[27]),构建了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组织具体实践间的桥梁,成为引领新组织分析的制度主义最新发展方向。

制度逻辑观的出现,始于对传统社会科学理论将社会因素或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排除在理论之外的批判。一方面,针对基于理性选择假说的经济学,政治学对工具性行为和和个人理性选择强调的

批判。经济学假定个体是孤立的行动者,并认为是个体理性选择导致了社会、组织(如国家、政党、企业、家庭)配置的形成。然而,经济学缺乏一种解释个体偏好形成的理论。Friedland 和 Alford (1991)^[1]则认为,个体效用是社会历史建构的,因制度而异。市场不仅是一种配置机制,也是一种具体的制度文化体系。经济学家将所有活动转化为市场活动、将所有问题视为经济问题。但实际上,其他制度领域(如国家、宗教、家庭)更可能产生价值,塑造个体效用。更为重要的是,基于不同制度所产生的个体效用间并不能相互抵消。换言之,经济学所强调的理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强调的非理性,并非“理性—非理性”间的对立,而是不同的超理性的制度秩序间的对立。诚如他们所言,“民众统治”“民族自决”“爱征服一切”“市场是有效的”等信念,并不比“上帝在天上监视着我们所有的人”这种看法更为理性(弗利兰德、阿尔弗德,2008)^[28]。另一方面,这一批判还针对主流组织理论将组织与其所处的具体制度环境或社会背景割裂开来(如资源基础观),或是将社会简化为一个抽象环境(如组织人口生态学)、组织场域(传统新制度理论)的趋势(Lounsbury 和 Boxenbaum,2013)^[29]。这与后来组织理论学者批评制度学派缺乏对社会结构中行为主体自我利益、能动性、权力的关注(河连燮,2014)^[30]形成呼应。认为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缺陷,使得传统的新制度理论无法对趋同化现象下的组织多样化形态以及制度变迁给出有效的解释(Thornton 等,2012)^[5]。

与传统制度观不同,制度逻辑理论将制度视为既是物质性实践性的,也是符号象征系统。制度建构生活的意义,不仅影响个体和组织偏好的形成,还进一步影响其满足偏好、获取利益的手段(Friedland,2012)^[27]。如果不把个体和组织行为置于其所处的具体社会背景之中,就无法全面、正确地理解它们(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进行一种非功能性的、非决定论的理解,将社会视为一种存在潜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并从三个分析层次——彼此竞争和谈判的个人、处于冲突和协调中的组织、彼此矛盾和相互依赖的(社会)制度,同时进行研究(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Thornton 等,2012^[5];杜运周、尤树洋,2013^[22])。只有这样,方能避免陷入诸如经济学理性主义等陷阱,避免在分析中将任何一种制度(如市场、民主)视为先决性的、主导性的。

在此基础上,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将西方社会解构为各种重要的制度性秩序。这一概念,或可称之为“核心社会制度”,实际上与社会学中“社会制度”或“社会部门”等概念类似(Greenwood 等,2014^[7];Thornton 等,2005^[31])。不同的社会核心制度——如资本主义、民主、宗教,代表着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理解世界的语言、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相处方式和交易模式,这些制度会根据其各自的中心逻辑——物质性实践与符号象征——形成独特的身份认同、塑造个体行为标准、建构组织原则。起初,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由资本主义、家庭、科层制政府、民主、基督教五大核心制度组成。后来,Thornton 等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将其扩张为家庭、社群、宗教、政府、市场、职业、企业七大当代西方社会核心制度(Thornton,2004^[32];Thornton 等,2005^[31];Thornton 等,2012^[5])。尽管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划分方法,但其背后一致的观念是:社会是由多重制度建构的,每一种制度都受其特有的核心逻辑的支配。在社会中运行于中观层次的组织、微观层次的个体,均受到这些多重制度所产生的多元逻辑(往往是矛盾、冲突的)的限制和使能,也常常能利用这些相互矛盾的逻辑(斯科特,2010)^[33]。

何为制度逻辑?制度逻辑概念和理论应用的高速增长,也往往伴随着原有内涵的扭曲和混淆(Thornton 和 Ocasio,2008^[3];Meyer 和 Hollerer,2014^[8]),因而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Thornton 和 Ocasio(2008)^[3]将“制度逻辑”定义为:社会建构的、历史性的文化象征符号、物质实践、假定、价值观和信念,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并赋予其意义。换言之,制度逻辑是指能够塑造行为主体认知和行为的信念和规则(Ocasio,1997^[34];Lounsbury,2007^[35];Dunn 和 Jones,2010^[36])。Thornton 等,2012^[5])。价值观是制度逻辑的核心(Friedland,2012)^[27]。在 Thornton 等(2012)^[5]的

描述中,则称之为各种制度的合法性来源,如家庭的合法性来源是“无条件忠诚”,社群的合法性来源是“互信互惠”,宗教的合法性来源是“神圣不可侵犯”,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是“民主参与”,市场的合法性来源是“市场决定价值”,职业的合法性来源是“职业技能”,企业的合法性来源是“市场地位”。制度逻辑决定了个体、组织如何认知以及回应多元制度环境,通过塑造微观层次的个体认知,进而影响组织的日常运作和战略决策。制度逻辑与组织场域、制度创业等概念紧密相关(Reay 和 Hinings,2009)^[37]。在组织层面,制度逻辑理论不仅关注主导逻辑转变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更关注组织所处环境中多元逻辑性质,尤其是组织如何回应这种制度复杂性及其互动过程(Lounsbury 和 Boxenbaum,2013)^[29]。

3. 制度逻辑理论文献网络与经典文献

一个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经典文献,是了解其发展脉络和观念体系的重要载体。WOS 数据库为本文提供了每一篇文献的引用文献,通过对这些引用文献的分析形成文献网络,能够有效地提供领域中的核心文献和研究趋势。参考涂智苹、宋铁波(2016)^[24],张秀萍、王振(2017)^[25]所采用的方法,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通过 Citespace V 软件,本文生成制度逻辑理论文献共被引网络(如图 3 所示)。通过图 3 可见,当前制度逻辑理论的核心文献共引关系较强,还未形成明显的聚类分化现象。表 1 展示了当前处于文献网络核心位置的十篇文献。从作者分布来看,Thornton、Ocasio、Lounsbury、Greenwood、Pache、Santos 等学者是这一学术共同体的中坚力量,均至少参与了两篇核心文献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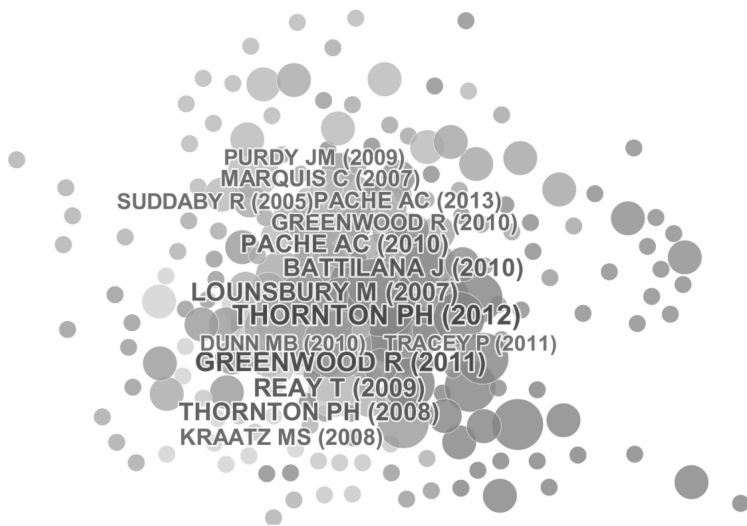


图 3 基于 Citespace 的制度逻辑理论文献共被引网络

资料来源:Citespace V 软件分析结果导出

制度逻辑理论高共被引文献

表 1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作者	年份	标题	期刊/出版社
1	130	0.12	Thornton PH Ocasio W Lounsbury M	201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123	0.04	Greenwood R 等	2011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续表 1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作者	年份	标题	期刊/出版社
3	95	0.08	Lounsbury M	2007	A Tale of Two Cities: Competing Logics and Practice Vari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izing of Mutual Fun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	94	0.11	Reay T Hinings CR	2009	Managing the Rivalry of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Organization Studies
5	90	0.07	Battilana J Dorado S	2010	Building Sustainable Hybrid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Commercial Finance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	87	0.03	Pache AC Santos F	2010	When Worlds Collide: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Conflicting Institutional Demand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7	84	0.01	Thornton PH Ocasio W	2008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8	62	0.11	Greenwood R 等	2010	The Multiplicity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Organization Science
9	58	0.06	Pache AC Santos F	2013	Inside the Hybrid Organization: Selective Coupling as a Response to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0	58	0.01	Kraatz MS 等	2008	Organizational Implications of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资料来源: Citespace V 软件统计结果导出

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献是 Thornton 等 2012 年发表的《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一书,作为制度逻辑理论的首本专著,该书在比较制度逻辑理论与以往新制度理论的基础上,正式将制度逻辑作为一个分析框架提出,归纳整理了制度逻辑系统理想类别(Thornton 等,2012)^[5],并提出了一个连接宏观 - 微观的多层次制度逻辑分析模型。该书的出现,显著地提高了制度逻辑理论所受的关注度,直接引领了当前的理论发展浪潮(如图 1 所示)。同样,作为理论的奠基性文章,2008 年发表在《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一书中的《Institutional Logics》一文,实质上是《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一书的前身,该文界定了“制度逻辑”的概念,总结了制度逻辑观作为一种元理论的五大基本原则:嵌入式能动、将社会视为制度间系统、制度的物质与文化双重基础、制度的多层次性以及历史权变性,以及制度逻辑塑造个体/组织行为的机制(Thornton 和 Ocasio,2008^[3];杜运周、尤树洋,2013^[22])。

引用频次第二高的文献是 2011 年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上的《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一文,在梳理过往制度逻辑研究的基础上,该文系统提出了“制度复杂性”概念以及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回应框架,构建了从宏观制度多元性到微观组织回应的互动过程,特别是强调了场域结构以及诸如企业结构、所有权等组织属性对组织回应制度复杂性的调节作用(Greenwood 等,2011)^[9]。相似的还有 Kraatz 等(2008)^[38]首次提出了“制度多元性”概

念,以及 Greenwood 等(2010)^[39]对制度逻辑多元性、非市场逻辑的强调,这三篇论文批判此前文献对主导逻辑的过分强调,共同回应了 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将社会作为一个存在潜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的呼吁。此外,Lounsbury(2007)^[35]验证了竞争逻辑会对组织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与基于绩效逻辑的纽约互助基金采用侵略型基金管理战略不同,基于信托逻辑的波士顿互助基金组织更倾向于长期投资与保守战略。Reay 和 Hinings(2009)^[37]、Pache 和 Santos(2010)^[40]则关注同一组织内竞争逻辑的管理和共存,认为竞争逻辑间的不兼容性应从“目标”和“手段”两个层面进行辨析。Battilana 和 Dorado(2010)^[41]、Pache 和 Santos(2013)^[42]将制度逻辑研究应用于混合型组织研究,由于混合型组织同时兼备多种逻辑,如小额信贷组织兼具慈善逻辑与市场逻辑,因而成为当前制度逻辑理论应用和探索的重要载体(Zhao 和 Lounsbury,2016^[23];Cobb 等,2016^[13])。

三、制度逻辑理论的发展演变:从主导逻辑到多元逻辑

1. 主导制度逻辑

从经典文献发表的年度来看,与当前学界将“制度复杂性”作为研究核心不同,早期文献(Lounsbury,2007)^[35]更为关注组织场域内竞争(往往是冲突的)制度对主导逻辑的争夺,及这种冲突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正如 Lounsbury(2007^[35];2013^[29])所指出的,受传统新制度理论强调同构以及稳定性的影响,即使认识到组织场域内多元制度逻辑的共存,早期的逻辑研究仍关注单一主导逻辑对组织同质化的塑造作用,这实质上并未逃脱以往传统新制度理论的范式(Haveman 和 Rao,1997^[43];Reay 和 Hinings,2005^[44])。

场域作为共享观念、认知的个体聚合而形成的制度生活领域(斯科特,2010)^[33],识别对个体/组织有塑造作用的制度逻辑将有助于界定场域边界。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将组织制度环境的改变简单地视为场域内主导逻辑的转变,认为尽管同时存在多元逻辑,但只有单一主导逻辑会对组织行为产生决定性作用(Dunn 和 Jones,2010)^[36]。一旦一种制度逻辑成为主导,便会引导决策者将焦点置于与主导逻辑相关的特定问题和解决方法上,而忽视其他非主导逻辑的诉求(Thornton,2004)^[32]。因而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多采用纵向历史研究的方法对组织不同时期的主导逻辑进行解读,分析主导逻辑间的争夺、冲突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如斯科特(2010)^[33]将美国医疗保健行业的场域冲突解构为不同时期不同主导逻辑的相互对立,强调其各自文化认知信念对组织的建构。Thornton 和 Ocasio(1999)^[45]对 20 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出版业的纵向历史分析则关注受不同时期主导逻辑的影响,管理者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行为。与早期的职业编辑逻辑使得出版社更为关注个人声望和关系网络、注重企业内部增长不同,当市场逻辑成为行业主导时,出版社则会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与竞争对手间的资源争夺和兼并之上。尽管这些研究开始关注不同逻辑转变对组织实践的影响,但也仅仅是将逻辑转变视为一种由外来力量或突发事件引起的阶段性影响,既没有就制度改变给出内源性理论解释,也没有逃脱以往制度观对制度扩散的强调,实际上仍是对不同时期内主导逻辑同构作用的强调(Lounsbury,2007)^[35]。

2. 制度逻辑多元性与多元逻辑性质

然而,组织实践必须与各种不同的环境相联系,其制度环境常常是多元化的,一个寻求长期稳定和内外支持的组织必然需要容纳相互矛盾的结构要素,并对多重的制度要求进行回应(斯科特,2010)^[33]。传统制度观以“脱耦”为核心构建组织应对社会多重制度压力的策略(Oliver,1991)^[46],制度逻辑理论则认为社会和社会关系不仅关乎物质结构的扩散,更关乎文化和象征符号(Thornton 等,2012)^[5],批判这种观点将制度的影响局限于实践层面,将制度压力简单视为组织外部压力,而忽略了制度对个体、对组织的深层次文化认知影响(Pache 和 Santos,2010)^[40],因而往往是不可持续的。一个组织场域往往是由两个,甚至更多,相互竞争、冲突的信念系统组成的(Scott,

1994)^[47]。因此,与早期对主导逻辑的追崇不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以一种更具碎片化、竞争性的观点来评估制度环境,认为组织场域内并不存在一个具备绝对支配地位的主导逻辑,而是同时存在多个能对组织行为产生限制和使能的矛盾逻辑。换言之,不再将多元竞争逻辑共存视为不稳定和不可持续的阶段性事件,而是视为组织所必须面对的常态(Jarzabkowski等,2010^[48];Dunn和Jones,2010^[36])。若称制度建构“游戏的规制”,那么组织便是长期“同时处于两场甚至更多的游戏之中”(Kraatz和Block,2008)^[38],必须同时遵守多样的游戏规则以获得生存的权利(合法性)。竞争逻辑的共存无疑对组织的长期生存提出了挑战,部分学者甚至认为,多元逻辑的存在将会威胁组织绩效甚至将导致组织的灭亡(Tracey等,2011)^[49],因此,多元逻辑如何共存、组织如何回应竞争逻辑,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Kraatz和Block(2008)^[38]将这种组织面临的多元制度要求称之为制度多元性;Zilber(2011)^[50]称之为制度多样性;Greenwood等(2010^[39];2011^[9])则称之为制度复杂性,并界定为组织所面临的“多元制度逻辑所带来的不兼容观念”(Greenwood等,2011)^[9]。

首先,组织面临多元逻辑的最直接证据来自于“混合型组织”的研究(Skelcher和Smith,2015)^[51]。混合型组织通常指用商业投资来解决迫切社会问题(如气候、贫困、农村)的组织,如小微信贷、社会福利组织。由于其同时兼容至少两种竞争逻辑——通常是商业/市场逻辑与社群/公益逻辑,因此,混合型组织,尤其是新创混合型组织,如何处理逻辑的冲突以兼顾不同的组织目标,成为一个极具理论挑战和现实意义的问题。Battilana和Dorado(2010)^[41]的研究表明,旨在帮扶、消减贫困的发展逻辑和旨在获利以维持组织运作的借贷逻辑之间,小微信贷组织可以通过设计一种独特的员工雇佣和培养政策,从而在两种竞争性逻辑间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实现混合型组织的发展和维持。

其次,职业型组织则是多元逻辑共存的另一大关注点(Kyratsis等,2017)^[52],如医疗机构(Dunn和Jones,2010^[36];Jarzabkowski等,2010^[48])、教育机构(Thornton等,2005)^[31]。与混合型组织不同,这类型组织是泾渭分明的不同职业群体间的结合,组织内部代表不同群体、不同身份认同的多元制度逻辑会试图争夺话语权以确保其自身信念的实现、利益的保障。如加拿大医保业,通过在实践层面达成多层次的务实性合作,代表医生的职业逻辑与代表管理层的商业逻辑可以形成一种长期的竞争且并行的休战状态。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逻辑间的对抗并不会削弱,不同子群间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差异仍将持续(Reay和Hinings,2009)^[37]。此外,家族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涉入使得其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必须将家族需求纳入考量,如何平衡家族逻辑与企业逻辑也成为当前理论关注的一大焦点(Zellweger等,2016^[12];Reay等,2015^[53])。

随着相关讨论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多元逻辑性质的认知亦不断深化。源于Friedland和Alford(1991)^[1]“制度是潜在矛盾”的假定,早期研究默认多元逻辑间是相互矛盾的、冲突的、不兼容的竞争关系,认为组织中矛盾逻辑通过竞争以获取主导地位,或是组织通过采取防御性行为,从而在多元逻辑环境中最小化内部冲突和外部合法性威胁(Greenwood和Suddaby,2006^[54];Smets等,2015^[55])。前者强调主导逻辑的转变,后者则强调组织在不同的场所、单元、实践中将竞争逻辑分割以削弱逻辑间的直接冲突,从而维持组织的长期运行(Lounsbury,2007^[35];Dunn和Jones,2010^[36])。然而,关于混合型组织研究的兴起,则从侧面验证了组织内竞争逻辑不仅可以交织共存(Battilana和Dorado,2010)^[41],甚至是维持组织生存所必须的(Pache和Sanots,2013)^[42]。换言之,不再将多元逻辑环境视为组织威胁,而是强调多元逻辑间存在兼容性,组织“拥抱多元逻辑”(Tracey等,2011)^[49]、将多元逻辑视为一个整体并采取积极的响应策略,将有助于组织拓宽现有的领域、获取额外的外部资源、促进组织创新(Mair和Hehenberger,2014^[56];Dufays和Huybrechts,2016^[57])。

进一步地,Smets等(2015)^[55]则认为,这种“冲突、分割—兼容、混合”的二元逻辑性质划分,无法有力地解释Friedland和Alford(1991)^[1]所强调的制度“相互依赖”这一概念,并基于全球最古老

的保险与再保险组织伦敦劳合社的纵向历史研究提出,市场逻辑与社群逻辑会长期地处于“冲突且互补”的状态,即竞争逻辑是冲突和互惠相互交织的。相似的还有 Venkataraman 等(2016)^[58] 基于北印度 NGO 组织 PRADAN 的研究指出,市场逻辑与社群逻辑间可以相互支撑并成为组织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而此前,由于市场逻辑强调个人利益、工具理性、金钱至上,社群逻辑强调群体福祉、情感联系、互利互惠,这两种逻辑一直被认为代表着竞争逻辑间冲突的极端,无法调节和兼容 (Marquis 和 Lounsbury,2007^[59];Schneiberg,2002^[60])。

从不同的研究出发,学界对多元逻辑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即存在冲突观、兼容共存观、互补互惠观等。然而,为何多元逻辑在某些组织中被视为不兼容的、竞争的,威胁组织生存的,而在某些组织中则被视为共存的、兼容的,有助于企业维持与发展的?这也吸引了部分学者对组织所处多元逻辑性质的进一步讨论。Besharov 和 Smith(2014)^[61]指出,多元逻辑的性质、内涵,取决于多元逻辑在具体组织内的实际作用情况。以兼容性来描绘与不同逻辑相联系的价值观、目标、行为一致性程度,以向心性来描绘不同逻辑对组织核心功能的影响程度,以并此构建象限划分不同的组织多元逻辑类型:竞争型、联合型、分割型、主导型。借鉴他们的研究框架,本文对当前部分文献的多元逻辑性质进行了划分(如图4所示),通过对比这些文献可以发现,不同的多元逻辑性质必然将导向不同的组织响应策略^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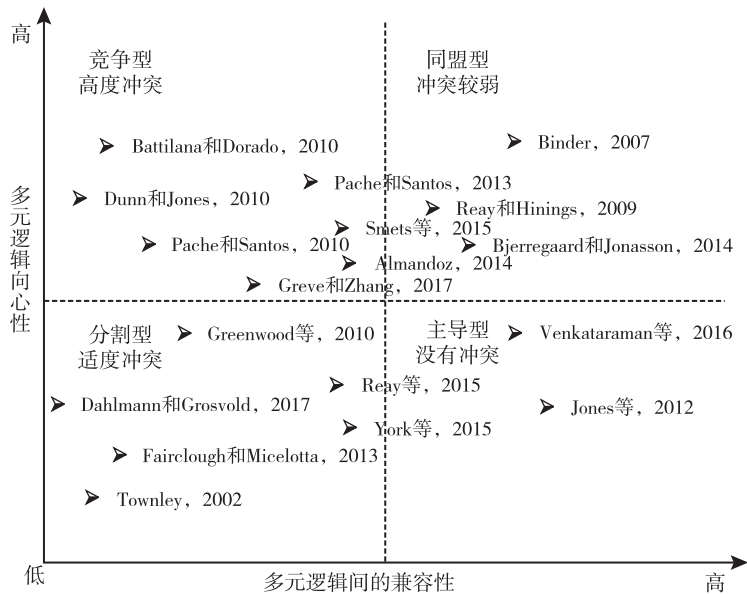


图4 组织内逻辑多元性类型划分

资料来源:本文在 Besharov 和 Smith(2014)^[61]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3. 多元逻辑与非市场逻辑

对制度逻辑多元性的强调,不仅批判早期学界对主导制度逻辑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制度复杂性,还批判这些研究对“非市场”制度和逻辑的忽视 (Greenwood 等,2010)^[39]。组织领域学者习惯于将关注的焦点放于市场、企业、职业等制度逻辑上 (Thornton 等,1999^[45],2002^[62],2004^[32];Lounsbury,2007^[35]),因为这类逻辑通常被视为是在场域、行业、组织内引发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Fairclough

① 围绕着多元逻辑性质与组织响应策略进行文献综述与进一步分析,将是极有价值的。然而,本文的目的在于明晰制度逻辑理论的发展脉络框架,并对其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同时,受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处并不详细展开。课题组将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和 Micelotta, 2013)^[63]。然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家庭、政府、宗教、社群等“非市场”逻辑不仅对当代组织的经济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还对组织形式与实践有着根源性的文化影响(Tracey, 2012^[64]; Luo 等, 2012^[65])。忽视或低估“非市场”逻辑对组织的影响无疑将大幅度削弱对制度复杂性和组织回应的整体把握。Greenwood 等(2010)^[39]基于西班牙制度复杂性的研究便指出,处于非主导地位的地方政府逻辑和家庭逻辑会影响组织如何回应主导的市场逻辑要求,这既体现在企业多元化选择上,也体现在企业的危机处理策略(如裁员)之中。

围绕混合型组织和家族企业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非市场”逻辑的讨论。如学者 Zhao 和 Lounsbury(2016)^[23]发现,尽管主导的市场逻辑会促进小微金融组织的商业、公众资源获取,但宗教差异的存在会削弱其商业资源的获取; Miller 等(2011)^[66]和 Belenzon 等(2016)^[19]引入制度逻辑理论为家族企业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强调由家族成员涉入所携带的家族逻辑将增强家族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和情感承诺,但同时也将导致企业战略决策行为更倾向于保守; Reay 等(2015)^[53]则进一步分析了家族逻辑、企业逻辑、社群逻辑间的交互作用。另外,部分学者则不局限于组织层面,强调非市场逻辑对更广泛的地区、社会的文化影响。如有学者描述在全面引进西方管理模式的大环境下,家文化对日本企业网络结构和具体管理实践的持续性影响(Bhappu, 2000)^[67]。也有人对意大利法律行业的研究显示,即使职业逻辑和市场逻辑成为当前行业主导逻辑,但受传统家文化的影响,企业仍更倾向于维持小规模运作、抵制并购和国际化行为以及抵制外部资本的进入(Fairclough 和 Micelotta, 2013)^[63]。并且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家逻辑的作用,并不局限于家族企业,且对非家族企业也有着相同的渗透力。

四、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回应

制度逻辑理论不仅关注制度复杂性对个体、组织的形塑作用,还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及其对多元制度环境的反馈作用(Gray 等, 2015^[68]; Lounsbury 和 Boxenbaum, 2013^[29]),强调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回应间的互动过程(Thornton 等, 2012^[5]; Besharov 和 Smith, 2014^[61])。在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Greenwood 等(2011)^[9]提出了从制度多元性、制度复杂性到组织回应的互动框架,特别是强调了场域结构和组织属性的对多元制度环境下组织所受制度压力的调节作用(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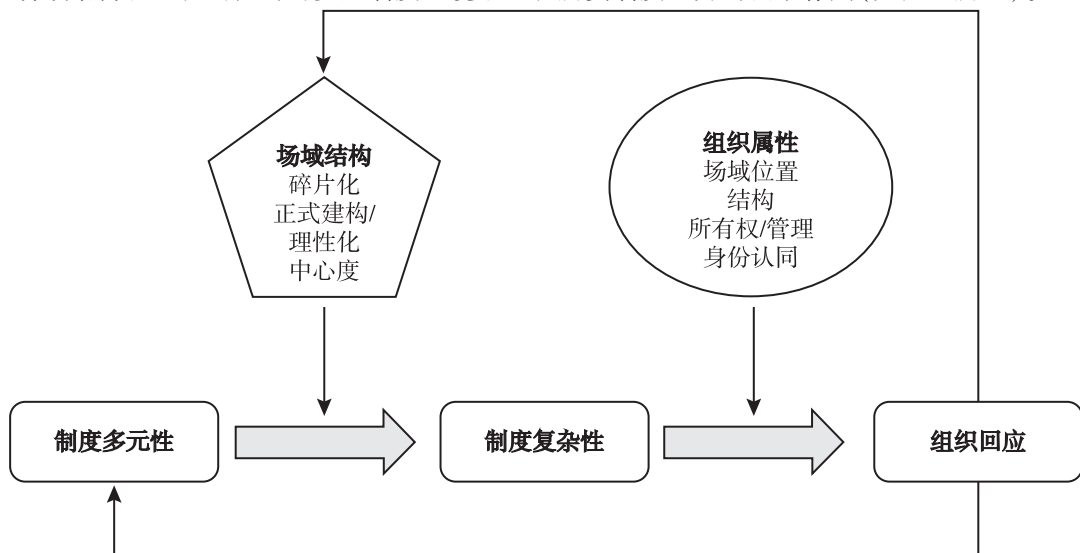


图 5 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回应

资料来源:Greenwood 等(2011)^[9]

制度逻辑观将社会视为一个存在潜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在这种制度多元性的环境下,组织所面对的制度复杂性从根本上受其所处组织场域结构的影响。在 Greenwood 等(2011)^[9]看来,制度复杂性包含两个内涵:一是逻辑的数量;二是不同逻辑间的兼容程度。而逻辑间的兼容性取决于不同逻辑所决定的目标及达成目标的手段间的差异化程度和明确性。组织所处场域的结构,诸如碎片化、正式建构、中心度等,会对多元制度环境下组织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产生影响,这不仅影响其面对的逻辑数量,还影响多元逻辑间的兼容性和程度(Greenwood 等,2011^[9]; Besharov 和 Smith, 2014^[61])。组织场域碎片化指控制着组织资源或合法性来源的成分间的不协调情况;正式建构指不同逻辑对组织的要求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中心度则指多元制度间的等级层次,中心度越强,则场域中的主导制度越明确。尽管正式建构的具体作用机制仍有待探索,但当组织场域碎片化程度越高、中心度越低时,组织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往往越高(Pache 和 Santos,2010^[40];Dunn 和 Jones, 2010^[36])。

另一方面,场域结构决定组织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但并非场域中每一组织所受的制度要求、压力均是一致的。Greenwood 等(2011)^[9]进一步指出,组织的具体属性(如组织所处场域位置、组织结构、所有权/管理、身份认同等)对组织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起到“过滤”的作用。首先,组织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中心还是外围(Battilana 等,2009)^[69],决定了组织受场域制度复杂性的压力大小和组织采取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大小。相较而言,处于场域间隙或是边缘的组织在回应制度复杂性时,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和自主裁量权。其次,将组织视为携带不同逻辑的群体的集合(Reay 和 Hinings,2009)^[37],这种组织结构不仅影响组织如何感悟、认知其所处的制度复杂性,还决定了组织如何回应这种制度复杂性的各种可能性选择的空间。再次,所有权和管理权则关乎不同群体对组织决策的影响力,强调个人、群体权力对组织文化的影响(河连燮,2014)^[30]。权力的配置决定着组织内何种逻辑处于优先次序进而决定组织回应制度复杂性的方向。最后,组织成员在回应制度复杂性时会努力保护其积极的身份认同,这决定了其应对场域压力的方式:抵抗还是接受。较强的组织身份认同将强化组织自信以及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Milliken,1990^[70];Gioia 和 Thomas, 1996^[71]),从而增强组织的自主裁量权。

总而言之,在多元制度逻辑的环境中,场域结构决定了组织所面临的制度复杂性,组织属性则对这种制度复杂性施加给组织的压力起到过滤作用,这两者决定了多元制度环境下组织进行响应:包括组织战略(Kraatz 和 Block,2008^[38];Pache 和 Santos,2010^[40])与组织结构(Reay 和 Hinings, 2009^[37];Battilana 和 Dorado,2010^[41])的各种可能性选择,界定了其自由度和自主裁量权的空间。此外,组织回应对场域结构和多元制度环境的反馈性影响,则将是制度逻辑理论下一阶段关注的焦点(Greenwood 等,2011^[9];杜运周、尤树洋,2013^[22])。正如 Thornton 和 Ocasio(2008)^[3]所强调的,多元制度逻辑与组织行为间是相互建构的,制度逻辑在塑造理性、塑造组织和个体行为的同时,也在后者的作用下发生强化或制度变迁。

五、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在文献检索和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制度逻辑理论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制度逻辑理论的文献网络和核心文献进行了提取,梳理了从主导逻辑到多元逻辑的理论演变过程,明确了制度逻辑理论与新制度理论的关系及其在制度学派中所处的位置。制度逻辑理论关注组织所处的多元逻辑环境对个体/组织认知和行为的塑造作用,强调制度复杂性与组织回应的互动过程。前人对制度逻辑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假设进行了系统的阐述(Thornton 和 Ocasio,2008^[3];杜运周、尤树洋,2013^[22]),本文则在文献检索分析的基础上,对制度逻辑理论的兴起、概念和发展脉络进

行梳理。本文为后来者了解和应用制度逻辑理论提供一个基本框架,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情境下实证应用的推广。进一步地,本文认为,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展开研究:

首先,制度逻辑理论将社会视为存在潜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尽管关于制度多元性和制度复杂性等相关概念已经被学界所认可、接受,但当前关于制度逻辑的讨论仍主要局限在简单的两种逻辑的讨论之上(Reay 和 Hinings, 2009^[37]; Venkataraman 等, 2016^[58]; Zellweger 等, 2016^[12]; Battilana 和 Dorado, 2010^[41])。在 Besharov 和 Smith(2014)^[61]看来,通过窥视两种逻辑间的关系从而对组织所处的制度复杂性进行分析,符合研究的简化原则且有利于逻辑共存理论的推导。然而,正如一些学者(Greenwood 等, 2010^[39]; Reay 等, 2015^[53])对家族逻辑、社群逻辑、市场/商业逻辑的研究所显示的,多元逻辑间存在相互强化的作用。换言之,单纯地关注二元逻辑,而忽视其他制度成分,甚至是非主导的制度成分,均将可能导致研究的结果出现偏差,从而导致结论的普适性存在疑问(Greenwood 等, 2011)^[9]。因此,未来研究或可从制度多元性着手,扩张现有关于二元逻辑的讨论。特别是多元逻辑间的共存状况,非主导逻辑与主导逻辑间的关系,非市场逻辑与市场逻辑间的关系等仍有待完善度议题。

其次,制度学派以“制度”为分析的核心,致力于解释制度压力下组织的同构现象,也即是通过解构“制度”来促进对组织现象的理解。然而,正如 Greenwood 等(2014)^[7]所指出的,当前制度理论学者以组织所处的场域作为研究层次,似乎将注意力过分地聚焦于“制度和制度化的过程”之上。换言之,当前学界更多地将“制度”视为研究的因变量、核心(如制度工作、制度创业以及大量的逻辑文献),而非“组织”。制度逻辑理论的出现为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提供了反思、重构的机会,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通过分析社会、场域、组织、个体等多个层面的相互嵌套、交织,学者可思考如何将研究的焦点重新聚焦于透过“制度透镜”来理解多样的“组织行为”(Greenwood 等, 2014)^[7],而非过分强调理解“制度”。

再次,未来亟需中国学者就中国情境下的制度逻辑理论展开研究。一方面,大量围绕着制度逻辑理论展开的实证论文已经证明了其在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以及欧洲大陆的适用性,但其在东方情境下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 Friedland 和 Alford(1991)^[11]、Thornton 等(2012)^[5]将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为七大社会层面的核心制度,然而,这一划分方式是否同样适用于东方情境亦还有待讨论。特别是,不同社会制度,如宗教、社群,所代表的不同价值观、合法性内涵亦仍存在争议。Friedland(2012)^[27]认为,与 Thornton 等(2012)^[5]的界定相比,用“爱、上帝、主权、私人财产、知识、资本”等来描述各种社会制度的核心价值观,或许是更为简洁和恰当的。尽管当前已有少数学者尝试使用制度逻辑理论对中国情境下特殊的组织现象进行解释,如郑莹等(2015)^[20]指出,转型经济下中国的官僚逻辑会削弱企业对正式制度环境变化的敏感度。然而,少数碎片化、缺乏相互呼应的文章,使得当前国内学界围绕着中国特色制度环境所展开的论述缺乏一致的界定,如关系逻辑、官僚逻辑、家族逻辑、家文化逻辑、宗教逻辑等概念仍有待国内学界进一步地明晰。因此,本文认为,基于东方情境、中国情境所展开的制度逻辑研究,有必要就社会层面的制度性秩序及其逻辑、核心价值观进行更为恰当的解构和描述。

最后,正如 Thornton 等(2012)^[5]所指出的,组织内多元逻辑的共存情况会随着时间、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诸如创业行为(Battilana 等, 2009)^[69]、组织内部实践的动态性(Bjerregaard 和 Jonasson, 2014)^[72]、外部事件(Thornton, 2004)^[32]等均可能引起组织内制度复杂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将时间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纳入考量,将对组织何时回应、如何回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Raaijmakers

等,2014)^[73]。因此,制度逻辑理论的完善需要未来的研究更多地将动态性和时间的视角加入分析之中。同时,围绕着组织内个体及其实践动态性的讨论,亦将有利于填补制度学派在解释个体行为和意图的微观基础方面的空缺。

参考文献

- [1] Friedland, R., and Alford, R. R.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 [M].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1991.
- [2] Gehman, J., Lounsbury, M., and Greenwood, R. How Institutions Matter: From the Micro Foundations of Institutional Impacts to The Macro Consequence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2016, (48A): 1-34.
- [3] Thornton, P. H., and Ocasio, W. Institutional Logics [M].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
- [4] [美] 鲍威尔, 迪马吉奥.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 [M]. 姚伟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5] Thornton, P. H., Ocasio, W., and Lounsbury, 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6] 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7] Greenwood, R., and Hinings, C. R., and Whetten D. Rethinking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4, 51, (7): 1206-1220.
- [8] Meyer, R. E., and Hollerer, M. A. Does Institutional Theory Need Redirecting?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4, 51, (7): 1221-1233.
- [9] Greenwood, R., Raynard, M., Kodeih, F., Micelotta, E. R., and Lounsbury, M.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1, 5, (1): 317-371.
- [10] Palermo, T., Power, M., and Ashby, S. Navigat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The Production of Risk Culture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7, 54, (2SI): 154-181.
- [11] Bode, I., Lange, J., and Marker, M. Caught in Organized Ambivalence: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The German Hospital Sector [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7, 19, (4): 501-517.
- [12] Zellweger, T., Richards, M., Sieger, P., and Patel, P. C. How Much Am I Expected to Pay for My Parents' Firm?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on Family Discount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6, 40, (5): 1041-1069.
- [13] Cobb, J. A., Wry, T., and Zhao, E. Y. Funding Financial Inclusion: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Contextual Contingency of Funding for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 (6): 2103-2131.
- [14] Carlsson-Wall, M., Kraus, K., and Messner, M.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ystems and The Enactment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Logics: Insights from A Football Organization [J].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2016, 32, (9): 45-61.
- [15] Dalpiaz, E., Rindova, V., and Ravasi, D. Combining Logics to Transform Organizational Agency: Blending Industry and Art at Alessi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6, 61, (3): 347-392.
- [16] Bishop, S. and Waring, J. Becoming Hybrid: The Negotiated Order on The Front Lin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J]. Human Relations, 2016, 69, (10): 1937-1958.
- [17] Bevort, F., and Pouffelt, 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Professional Services Firms: Too Good to be True? Transcending Conflic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J]. Zeitschrift Fur Personalforschung, 2015, 29, (2SI): 102-130.
- [18] York, J. G., Hargrave, T. J., and Pacheco, D. F. Converging Winds: Logic Hybridization in the Colorado Wind Energy Field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59, (2): 579-610.
- [19] Belenon, S., Pataconi, A., and Zarutskie, R. Married to the Firm? A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f the Social Context of Ownership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 (13): 2611-2638.
- [20] 郑莹, 陈传明, 张庆奎. 企业政策敏感性研究——制度逻辑和企业所有权的作用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5, (9): 42-50.
- [21] 余菁, 王涛. 繁复现实下的简约制度: 一个新分析框架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5, (12): 171-184.
- [22] 杜运周, 尤树洋. 制度逻辑与制度多元性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研究展望 [J]. 上海: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 (12): 2-10.
- [23] Zhao, E. Y., and Lounsbury, M.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Approach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arket Logic,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6, 31, (6): 643-662.
- [24] 涂智苹, 宋铁波. 制度理论在经济组织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综述——基于 Web of Science (1996—2015) 的文献计量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6, (10): 184-199.

- [25] 张秀萍,王振. 社会网络在创新领域应用研究的知识图谱——基于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J]. 北京:经济管理,2017,(10):192-208.
- [26] Greenwood, R., Oliver, C., Suddaby, R., and Sahlin, K. Introduction[M].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8.
- [27] Friedland, R. Book Review: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J]. Management,2012,15,(5):583-595.
- [28] [美]弗利兰德,阿尔弗德. 把社会因素重新纳入研究之中[A]. 姚伟译. 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C].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29] Lounsbury, M., and Boxenbaum, 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Action[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2013,(39A):3-22.
- [30] [韩]河连燮. 制度分析 理论与争议(第二版)[M]. 李秀峰,柴宝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 [31] Thornton, P. H., Jones, C., and Kenneth, K.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Transformation in Accounting, Architecture[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2005,(23):125-170.
- [32] Thornton, P. H. Markets from Culture: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 [33] [美]斯科特. 制度与组织(第三版)[M]. 姚伟,王黎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34] Ocasio, W.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18,(S1):187-206.
- [35] Lounsbury, M. A Tale of Two Cities: Competing Logics and Practice Vari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izing of Mutual Fund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2):289-307.
- [36] Dunn, M. B., and Jones, C.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Institutional Pluralism: The Contestation of Care and Science Logics in Medical Education, 1967-2005[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0,55,(1):114-149.
- [37] Reay, T., and Hinings, C. R. Managing The Rivalry of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J]. Organization Studies,2009,30,(6):629-652.
- [38] Kraatz, M. S., Block, E. S., Glynn, M. A., Lounsbury, M. and Davis, J. Organizational Implications of Institutional Pluralism[M].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8.
- [39] Greenwood, R., Diaz, A. M., Li, S. X., and Lorente J. C. The Multiplicity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J]. Organization Science,2010,21,(2):521-539.
- [40] Pache, A. C., and Santos, F. When Worlds Collide: The Internal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Conflicting Institutional Demand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0,35,(3):455-476.
- [41] Battilana, J., and Dorado, S. Building Sustainable Hybrid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Commercial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0,53,(6):1419-1440.
- [42] Pache, A. C., and Santos, F. Inside The Hybrid Organization: Selective Coupling as A Response to Compe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3,56,(4):971-1001.
- [43] Haveman, H. A., and Rao, H. Structuring a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stitu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evolution in the Early Thrift Industr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7,102(6):1606-1651.
- [44] Reay, T., and Hinings, C. R. The Recomposi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ield: Health Care in Alberta[J]. Organization Studies,2005,26,(3):351-384.
- [45] Thornton, P. H., and Ocasio, W.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ingency of Power in Organizations: Executive Succession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Industry, 1958-1990[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9,105,(3):801-843.
- [46] Oliver C.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1,16,(1):145-179.
- [47] Scott. W. Richard. Conceptualizing Organizational Fields; Link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al Systems[A]. In System Rationality and Partial Interests[C].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1994.
- [48] Jarzabkowski, P., Matthiesen, J., and Ven, A. V. D. Doing Which Work? A Practice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Pluralism[A]. In Institutional work; Actors and Agency in Institutional Studies of Organizations[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 [49] Tracey, P., Phillips, N., and Jarvis, O. Bridging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a Multilevel Model[J]. Organization Science,2011,22,(1):60-80.
- [50] Zilber, T. B. Institutional Multiplicity in Practice: A Tale of Two High-Tech Conferences in Israel[J]. Organization Science,2011,22,(6):1539-1559.
- [51] Skelcher, C., and Smith, S. R. Theorizing Hybridity: Institutional Logics, Complex Organizations, and Actor Identities: The Case of

Nonprofits[J].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5,93,(2):433-448.

[52] Kyratsis, Y., Atun, R., Phillips, N., Tracey, P., and George, G. Health Systems in Transiti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Work in the Context of Shifting Institutional Log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7,60,(2):610-641.

[53] Reay, T., Jaskiewicz, P., and Hinings, C. R. How Family, Business, and Community Logics Shape Family Firm Behavior and “Rules of The Game” in An Organizational Field[J]. *Family Business Review*,2015,28,(4):292-311.

[54] Greenwood R, Suddaby R.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 The Big Five Accounting Fir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1):27-48.

[55] Smets, M., Jarzabkowski, P., Burke, G. T., and Spee, P. Reinsurance Trading in Lloyd's of London: Balancing Conflicting-yet-complementary Logics in Practi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5,58,(3):932-970.

[56] Mair, J., and Hehenberger, L. Front-stage and Backstage Convening: The Transition from Opposition to Mutualistic Coexistence in Organizational Philanthrop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4,57,(4):1174-1200.

[57] Dufays, F., and Huybrechts, B. Where do Hybrids Come from? Entrepreneurial Team Heterogeneity as An Avenue for the Emergence of Hybrid Organizations[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2016,34,(6):777-796.

[58] Venkataraman, H., Vermeulen, P., Raaijmakers, A., and Mair, J. Market Meets Community: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Strategic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Work[J]. *Organization Studies*,2016,37,(5):709-733.

[59] Marquis, C., and Lounsbury, M. Vive La Résistance: Competing Logic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U. S. Community Banking[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7,50,(4):799-820.

[60] Schatzki, T. R. The Site of The Social: A Philosophical Account of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al Life and Change[M].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1] Besharov, M. L., and Smith, W. K.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Organizations: Explaining Their Varied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4,39,(3):364-381.

[62] Thornton, P. H.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ion in a Craft Industry: Conflict and Conformity in Institutional Log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2,45,(1):81-101.

[63] Fairclough, S., and Micelotta, E. R. Beyond the Family Firm: Reasser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Institutional Logic Across Organizations[J].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39B):375-410.

[64] Tracey, P. Religion and Organ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2,6,(1):87-134.

[65] Luo, Y., Huang, Y., and Wang, S. L. Guanxi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12,8,(1SI):139-172.

[66] Miller, D., Le Breton-Miller, I., and Lester, R. H. Family and Lone Founder Ownership and Strategic Behaviour: Social Context,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Logic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1,48,(1):1-25.

[67] Bhappu, A. D. The Japanese Family: An Institutional Logic for Japanese Corporate Networks and Japanese Managemen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2):409-415.

[68] Gray, B., and Purdy, J. M., Ansari S. From Interactions to Institutions: Microprocesses of Framing and Mechanisms for The Structuring of Institutional Field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5,40,(1):115-143.

[69] Battilana, J., Leca, B., and Boxenbaum, E. How Actors Change Institutions: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09,3,(1):65-107.

[70] Milliken, F. J. Perceiving and Interpret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An Examination of College Administrators' Interpretation of Changing Demographic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0,33,(1):42-63.

[71] Gioia, D. A, and Thomas, J. B. Identity, Image, and Issue Interpretation: Sensemaking During Strategic Change in Academia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41,(3):370-403.

[72] Bjerregaard, T., and Jonasson, C.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Contend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roup Dynamics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4,25,(4):651-666.

[73] Raaijmakers, A., Vermeulen, P., Meeus, M., and Zietsma, C. I Need Time! Exploring Pathways to Compliance Under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5,58,(1):85-110.

From Ontological Perception to Strategic Behavioral Orientation: A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LIANG Qiang, XU Er-ming

(School of Business,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 China)

Abstract: Studi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re the latest research trend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Since 1991, when Friedland and Alford pioneered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into th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theoretical analysis,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nd became a hot topic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after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 exploration, with especially the institutionalists’ seeking internal reform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the last ten years. Unlike the traditional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which is devoted to explaining how the dominant logic shapes homogenization of organization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regards the society as an inter-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emphasizes that these institutions are potentially contradictory and hence make heterogeneity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rough exploiting these contradiction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also transform the institutional relations of society.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responds to the critique of the organizational scholars on the traditional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builds a bridge between the macro-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micro-individuals, which has bee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urrent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s a new and rapidly developing theory, foreign scholars have obtained many valu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 concerning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but there are still few preeminent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among indigenous Chinese scholars. This study organized the core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 skeleton of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hoping to promote furthe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a.

First of all, this study conducted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Taking 342 papers about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of business or management from WOS database from 2007 to 2016 as our data sources, we reviewed the origins of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skeleton, defined the connotation and core concepts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nd extracted the literature network and key documents. Secondly, we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dominant institutional logic-multiple logics” process. Especial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ture of multiple logics and non-market logics were stress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nd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was clarified. Finally, we elaborated on the core topics of interactiv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focusing on how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shapes individual /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ultip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 organizatio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earch and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d a fundamental framework for later scholars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nd helped to promote furthe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China. We argued that future research may expand from aspects as follow: (1) Focus on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and expand the existing discussions on binary logics, especially subjects like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logic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dominant logics and dominant logic,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market logics and market logics; (2) Consider “organization” as the focus of research rather than “institu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interweaving of social, field,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 levels, scholars can rethink how to refocus their 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rough “institutional lens”, rather than over emphasize on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 promot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henomenon of organization; (3) Make endeavors to develop appropriate deconstru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institutional order and its core values based on eastern or Chinese cultures and situation; (4) Add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and time into analysis to improve and perfect the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dominant institutional logic; competing logics

JEL Classification: D02, M10, O43

DOI: 19616/j.cnki.bmj.2018.02.011

(责任编辑:文 川)